

《同舟共进》精选
重大事件见证
权威史家叙述
看“大家”，读《同舟》，
世间诸事不糊涂。

文人谈片

王家声 等主编

W.A. 世界知识出版社

文人谈片

王家声 应春山 主编
孙宏光 郭芙秀

 世界·文学 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人谈片 / 王家声主编. —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
2013.12

ISBN 978-7-5012-4593-2

I. ①文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文化史—中国—近现代—
通俗读物 IV. ①K250.3-49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306230号

责任编辑
责任出版
责任校对

胡孝文
赵 玥
丁洁琼

书 名

文人谈片
Wenren Tanpian

主 编

王家声 应春山 孙宏光 郭芙秀

出版发行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

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(100010)

网 址

www.wap1934.com

经 销

新华书店

印 刷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印张

718 × 1000毫米 1/16 27印张

字 数

388千字

版次印次

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

标准书号

ISBN 978-7-5012-4593-2

定 价

5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1980年代的曹禺与巴金	李 辉 / 1
冯友兰历史沉浮的标本意义	施京吾 / 15
“不死鸟”张奚若	王开林 / 27
胡适：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	王开林 / 38
刘文典：“狂”名满天下	王开林 / 51
施剑翘：刺虎犹如刺绣时	王开林 / 61
钱钟书“痴改”乔木诗	杨建民 / 72
钱钟书是“御用翻译”吗	钱之俊 / 83
郭沫若：写与不写的纠结	冯锡刚 / 93
郭沫若与毛泽东《词六首》	冯锡刚 / 104
翦伯赞现象	靳树鹏 / 112
陶行知当年的“深思”与“多虑”	周正章 / 122
冰心，被忽略的女性智慧	张耀杰 / 127
丁玲：一道悲壮的风景	盛 夏 / 136
同一位萧军	刘诚龙 / 145
夏衍的苦痛与自省	孟 醒 / 151
吴祖光、周恩来与《风雪夜归人》	王 凡 / 160

水与雪：沈从文的生与川端康成的死.....	李扬帆 / 168
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	
——赵树理的困惑	陈为人 / 174
邵洵美：蝴蝶飞不过沧海	北落师门 / 183
“一代诗哲”方东美	刘 超 / 196
江亢虎：从“弄潮儿”到“落水者”	蔡登山 / 206
在台北图书馆“温故”	叶永烈 / 212
政治诗词“九一三”	散 木 / 219
我们和我们的时代	陈平原 / 230
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·盖茨	刘道玉 / 234
从电视剧看三十年社会思想流变	顾 土 / 239
奢靡殡葬：从“房奴”到“坟奴”	资中筠 / 248
梦里的“打饭”情结	邵燕祥 / 252
蔷薇叶子（三则）	邵燕祥 / 256
忽然想到——关于口号	陈四益 / 262
误读鲁迅	
——以吸烟为例	陈四益 / 267
从春秋到明清：国民性的“大退步”	张宏杰 / 273
历史能否戏说	张宏杰 / 283
当晚清碰到晚明	
——辛亥背后的难题与机遇	李扬帆 / 288
假如袁世凯死于1913	张宏杰 / 294
明王朝“权末代”的可悲结局	张宏杰 / 301
对话与共识：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	傅国涌 / 309
往事未必如烟	
——两位戏曲研究专家的恩怨分合	黄天骢 / 318

宏聪师：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追寻.....	王家声 / 326
永葆赤子之心	
——重读《傅雷家书》有感.....	章开沅 / 332
流水洗心听清音	
——马连良谈片.....	施京吾 / 337
总统与一本教科书的较量.....	袁南生 / 346
甘坐冷板凳的印度知识分子.....	袁南生 / 351
解读孔子铜像与马丁雕像.....	安立志 / 356
肖洛霍夫“左”“右”逢源的代价.....	陈为人 / 361
苏俄禁书成了中学教科书	
——《古拉格群岛》命运之变迁.....	蓝英年 / 372
苏维埃大厦里埋藏的导火索.....	余一中 / 378
看苏俄领导人如何“为国操劳”.....	述 弢 / 385
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了什么.....	狄 马 / 392
高尔基之死.....	吴跃农 / 403
你不知道的高尔基.....	徐元宫 / 414

1980年代的曹禺与巴金

李 辉

“与巴金相比，我简直是个混蛋！”

奇怪，1980年代见曹禺先生的次数很多，却没有任何个人交往，甚至连一次访谈也没做过。当年的笔记本上，我记录下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会议，可是，曹禺先生除了出现过大名之外，连片言只语都没在我的记录里留下。

但记忆中的两个场景，印象一直清晰无比。

第一个场景，凝固在我为他拍摄的一张照片上。时间：1984年底，地点：北京崇文门新侨饭店。

“文革”后复出的丁玲，在与周扬等人几年摩擦、冲突后，雄心不已，终于独立创办一本文学杂志——《中国》。为庆贺《中国》创刊，丁玲特意在新侨饭店举行大型招待会。几代作家三四百人，不论亲疏与否，也不论当时习惯按照思想倾向划分的“左、中、右”，齐聚一堂。在这一场合，作家们一时间似乎都忘记了差异区别，为堪称“同人刊物”的《中国》庆生。记忆中，这也是那一年北京最为热闹而自由的文坛聚会。

那一次，曹禺也来了。看到他与萧乾、吴祖光三人在一起寒暄，我赶紧按下快门。巴金曾一再说，他的朋友中，三个人最有才气，即沈从文、曹禺、萧乾。这张照片能够同时留下萧乾与曹禺的身影，对我而言，自然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。照片上，萧乾谦恭地弯腰与曹禺握手，曹禺戴一副太阳镜礼貌而平静地与之相对，吴祖光站在中间，看着

萧乾，笑得爽朗。三人之间，有着特殊的历史关联，1957年的“反右运动”曾把三人连在一起——当年局势下，站在运动前列的曹禺，分别发表檄文严厉批判萧乾、吴祖光。历史翻过一页，新侨饭店的这一瞬间，欢笑早把阴影驱散。曹禺与萧乾之间的故事，则开始得更早，也更为复杂，从193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，半个世纪的亲疏恩怨，留在以后另作叙述。

第二个场景刻在我的记忆里。时间：1988年4月，地点：北京北太平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。

这一年，新影厂完成了定义为“彩色长纪录片”的《巴金》的拍摄，纪录片解说词由黄裳先生执笔，编导张建珍，摄影周俊德、钱厚祥。我曾数年报道新影厂，且是研究巴金的年轻人，也在邀请之列。

那天看片的人不多，座谈时人更少，约十多位。曹禺在夫人李玉茹的陪同下，从始至终参加。这一次，曹禺显得格外兴奋，或许人少的缘故，也与当时思想界气氛极为活跃有关，座谈时，他的即兴发言轻松、洒脱，一开口，便引起一阵欢笑。

“我与巴金是老朋友了。我的几个老婆也都与他关系很好。”

李玉茹老师在一旁立即纠正：“你只有一个老婆啊！”

曹禺一笑，赶紧说：“不，我的前后几个老婆都与他关系好。我们两家一直很好。”

人们谈友谊，谈电影，谈得最多的是“文革”后写作《随想录》的巴金。曹禺肯定巴金的独立思考和提倡讲真话，忽然，他的声调高亢许多：“与巴金相比，我简直是个混蛋！我简直不是人！”

一字一顿，响如洪钟。许多话我都记不确切了，但这两句话语气激烈，超出我的想象，一经听过，再也难忘。在我来到北京的几年时间里，听说过他的一些传言，也亲历过他在不同场合的表态，知道他在1980年代文化界的反思潮流中，与写作《随想录》的巴金有相当大的差异。但此刻，绝对没有想到他竟会用这样一种无情贬斥自己的方式，来表达对老朋友巴金的爱戴与敬重。顿时，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

就在看片会的当天晚上，曹禺致信巴金，这样写道：

……我看你的纪录片后，感情激动，大家要我谈，我就说了几句。

也许说过了一点，但却是我的真心话。（1988年4月11日）

最激烈的言辞与最真切的震惊，一直无法忘记。

印象中，纪录片《巴金》后来似乎只在上海放映过，并没有按计划在全国公映。电影海报上，选用高莽先生画的一幅巴金低头思索缓步而行的素描。如今，再看海报，耳边又响起曹禺高亢的声音……

1979：曹禺、巴金的不同转折

面对老朋友巴金，曹禺在1988年春天迸发而出的自我鞭挞，虽颇有戏剧效果，却又并非没有内在的必然。可以说，他对近十年的自我反省，浓缩在那一两句的迸发中。

曹禺与巴金在“文革”之前的经历与境况大致相似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，他们走过的无外乎也是自我批判、明哲保身、人云亦云、批判他人等这样几个阶段，在被动地批判自己和参与批判他人的过程中，在精神不断被扭曲的状态下，以积极配合而求安稳。“文革”突兀而来，他们再也无法逃避，只能在精神受折磨、人格受凌辱的日子里默默走过。但他们还是和许多朋友一样，等到了“文革”结束，等到了生命的重新开始。

1979年，对曹禺、对巴金而言，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——前者，婚姻生活的重新开始；后者，写作《随想录》高潮的到来。

巴金的《随想录》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。与此同时，他准备着1979年4月的重访法国。不少巴金研究者都非常看重巴金早年思想和道德观与《随想录》的关系。我也同样。我甚至认为，准备重返法国以及随后的重返法国，为开始独立思考、提倡说真话的巴金，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。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、思虑，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。认识更加深切，表述也更加明确。

我注意到，《随想录》刚开始写作时，巴金在家里接待过几位法国汉学家，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《“长官意志”》中提到了此事。第十篇就是《随想录》中非常重要的一篇《把心交给读者》。1979年2月3日写作的这篇长文，带有“宣言”性质。文章开头记叙巴金和友人黄裳

的对话，巴金告诉黄裳，他要把《随想录》当作遗嘱来写，他要把心交给读者。正是在这篇文章里，巴金深情地回忆自己1927年的巴黎生活，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：卢梭、伏尔泰、雨果、左拉，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、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。就是在这样的回顾中，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。

经过1979年的写作，一个开始反思的、有着全新精神面貌的巴金，出现在人们面前。此时的巴金，多么希望老朋友曹禺能够与他一样投入独立思考的行列，以新的创作、新的面貌告别历史。

巧的是，巴金《随想录》的写作，一开始就与曹禺有着直接关联。

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，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项内容，是在中国公映三部日本电影：《追捕》、《望乡》、《狐狸的故事》。描写日本妓女阿崎婆一生故事的《望乡》，在中国公映后引发激烈争论，有的批评者甚至将之归为“黄色电影”，主张禁演。一位当年在部队服役的军人回忆说，当时他们突然接到更改休息日的通知，内容是：“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”，目的是要避开影片《望乡》的放映日，以不让军人到地方电影院观看。（郭根群《1978年邓小平访日后的日本电影热》）《望乡》引发的社会震动，可见一斑。

巴金《随想录》的最初两篇恰恰都是谈《望乡》。巴金挺身而出，明确表示反对删剪电影，反对禁演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巴金以替《望乡》辩护为肇始，开始了晚年用写作干预现实、反思历史的双重使命。

刚写完第一篇《谈〈望乡〉》，曹禺从北京来到上海，向巴金讲述了与《望乡》相关的内幕，这促成了巴金写下了第二篇《随想录》——《再谈〈望乡〉》。巴金开篇便提到曹禺：

曹禺最近来上海，闲谈起来，他告诉我，不久前他接待过几位日本影剧界的朋友，他们谈了一些关于《望乡》的事情。据说《望乡》送来中国之前曾由影片导演剪去一部分，为了使这影片较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。我们最初就是根据这个拷贝放映的。过了日本电影周之后，主管部门又接受一部分观众的意见，剪掉了一些镜头。曹禺还听说，这部影片有些镜头是在南洋拍摄的，在拍摄的时候导演、演员、工作人员都吃了苦头，这说明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严肃认真；还有扮演阿崎婆的

演员，为了使她的手显得又粗又老，她用麻绳捆自己的手腕，至于怎样捆法我听过就忘记了，现在也说不清楚，不过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，但后来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……

我揣摩，巴金写作此文时，如此突出地提到曹禺，是否有一种愿望，欲借此激励这位挚友与他一起在新的时代并肩前行呢？

1979年底，巴金给曹禺写去一封长信，既为曹禺与李玉茹女士的黄昏恋送去祝福，更以一位老朋友的推心置腹，坦率地鼓励曹禺鼓起勇气，开始新的写作。重访法国归来的巴金，甚至还寄希望予即将出访的曹禺，能够在外面的世界汲取新的养分。“心里有扑不灭的火”的巴金，在信中这样说道：

你、你们好好地生活吧，我相信你们这次的决定，也相信你们会好好地安排一切。只要你们过得好，过得幸福，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？应当勇敢些，高高兴兴地向前看。既然自己考虑过了，决定了，还怕别人不了解干吗？还怕别人议论干吗？

你有很高很高的才，但有一个毛病，怕这怕那，不敢放胆地写，顾虑太多。你应当记住，你心灵中有多少宝贝啊。不要说，你“感觉肚子空了”。连我也感觉到心里有扑不灭的火呢！你可以慢慢来，不用急。

你不久便要出国，出去看看，扩大眼界看看新东西，也好。你高高兴兴地、信心百倍地完成这个任务吧。回来建设你们的新家庭，以后你会写出好作品来。（1979年12月25日）

巴金的期待却落空了。

曹禺痛苦坦言：“十分讨厌我自己”

1980年代初，当巴金一篇接一篇地写作《随想录》时，曹禺依旧没有走出旧日阴影，现实舞台旋转不定，公开发言的姿态也随之旋转不定。最突出的例子即1981年春夏之际的《苦恋》风波。

由作家白桦与长影厂导演彭宁合作创作的电影剧本《苦恋》，发表于《十月》杂志1979年第3期。《苦恋》主人公、画家凌晨光的原型是

画家黄永玉。黄永玉曾对我说过，白桦最初准备根据他的经历拍摄一部纪录片，并完成了解说词在香港发表。但黄永玉后来听从夏衍的意见，不想以真实身份出现。在此情形下，白桦与彭宁遂在原有基础上对主人公和剧情进行再创作，纪录片变为故事片，一个人的故事，也演绎成对归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，在“文革”中受到磨难的命运描述。主人公的女儿曾反问父亲：“您爱这个国家，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……可这个国家爱您吗？”这句著名台词，可看作《苦恋》篇名的由来。

《苦恋》拍摄电影时，易名为《太阳与人》。电影尚未公映，1981年4月，《解放军报》等报刊发表文章，对《苦恋》进行政治批判，一时间，山雨欲来，人心惶惶。支持或反对，批判与反批判，从庙堂到民间，几乎每一个层面都牵涉其中。

据《走进巴金四十年》一书作者陈丹晨所述，《苦恋》风波期间，巴金与曹禺的态度颇有差异。

陈丹晨早在1960年代结识巴金，1981年任《文艺报》副主编。《苦恋》风波尚未平息之际，他见到了途经北京再次前往巴黎访问的巴金。两人有了一次无拘束的长谈：

一九八一年九月，巴老率团去巴黎参加第四十五届国际笔会大会，住北纬饭店。

我刚坐下，巴老就问：“他们倒没有叫你写批《苦恋》的文章。现在这种做法太恶劣，比过去还要恶劣！”他是指电影《苦恋》不让公开放映，却要公开批判，弄得老百姓莫名其妙！他不是从这个电影的成败得失来说的。他为我担心，怕我卷进去。

那晚，巴老还很激动地说：“过去，我们从政治上相信上面，叫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说胡风是反革命，我们也跟着说。这样的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交代！”“现在又搞这样的批判，怎么可以这样强加于人呢！硬要人家改！那你来好了！有的是作品中人物说的话，怎么可以当成作家的话来批呢？”（《走进巴金四十年》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）

就在巴金访问法国期间，一件令他气愤的事情发生了。出国之前，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，巴金撰写《怀念鲁迅先生》一文，但文章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发表时，却因受到《苦恋》风波影响，凡涉及反思“文革”的内容，均被删节。巴金在这篇文章里曾这样写道：

十年浩劫中我给“造反派”当成“牛”，自己也以“牛”自居。在“牛棚”里写“检查”、写“交代”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，心安理得。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，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做“牛”。但先生“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和血”。我呢，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“牛”。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，只要能挣断绳索，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。

巴金回国后，方从朋友处获知上述文章均遭删削。气愤中，他再写《“鹰的歌”》，倔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：

读完被删削后的自己的文章，我半天说不出话，我疑心在做梦，又好像让人迎头打了一拳。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。鲁迅先生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？我还要继续发表我的“随想”。

与巴金一样，曹禺在《苦恋》风波中也受到波及。

同年，导演凌子（叶剑英之女叶向真）将曹禺早年剧作《原野》搬上银幕，女主角刘晓庆、男主角杨在葆，均是当时最红的明星。电影《原野》参加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，并获得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，这应是中国电影界在威尼斯电影节的首次亮相。然而，归国后电影审查未获通过，不能在国内公映。（1988年《原野》最终获准在中国内地公映，并荣获该年度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）据导演凌子后来透露《原野》被禁原因：审片时有人指责女主角镜头太裸露，影片渲染暴力、复仇……电影《原野》被禁，对曹禺无疑是一次新的打击，更是一次考验。

陈丹晨回忆说，他在9月见到巴金时，还谈到他所亲历的曹禺在一次批判《苦恋》座谈会上的发言：

于是，我又说起曹禺在一次会上的发言。他说看了《苦恋》，气愤极了，恨不得一头把电影银幕撞碎（大意）。我对曹禺从来就很崇拜，但对他跟风特别紧，批判别人用语特别激烈，直到如今“文革”以后还是这样，颇为大惑不解。我知道巴金和曹禺是几十年的老朋友，所以我问巴老：“他为什么这样？难道过去的教训还不够吗？”

巴老沉吟了一会，说：“嗨！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和做法……”

以极其夸张的表述参与批判《苦恋》，未必出自曹禺本意。后来，风波过去，他在写给巴金的一封信中，这样提到《苦恋》与《原野》被“捆绑”押上政治舞台时他的经历：

《文艺报》登了唐的《我爱〈原野〉》，据说写得好。《原野》久不得认识，倒无所谓，只是曾与《苦恋》（该剧全国评论也是不公，我要去评论，系旧日恶习！）同在文学家们面前共在一上午同放该电影以便批判，此一着，诚属意外，数十年前旧作，也拿出来“鞭尸”，威风凛凛，真是得意之极！

其实，1981年乃至后来一些年里，曹禺内心极为痛苦。极具戏剧性效果的批判，或许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。在他，这一行为方式，早成惯性。他又并非完全麻木，相反，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怯弱，内心的清醒总是让他处在孤独、苦闷之中。这里，不妨摘录新近公开的曹禺1981年的部分日记如下：

巴金使我惭愧，使我明白，活着要说真话。我想说，但却怕说了很是偏激。那些狼一般“正义者”将夺去我的安静与时间，这时间，我要写出我死前最后一两部剧本。（1981年6月17日）

我每见巴金，必有所得。我一向无思想，随风倒，上面说什么，便说什么，而且顺着嘴乱讲。不知真理在何处。一定要独立思考，不能随风倒，那是卑鄙、恶劣的行为。既错了，便不要再折磨自己，想起没

完。让过去成为过去，让自己清醒些！今后，不再上当。少说，错误少些。（1981年10月19日）

我的阳光快尽，烛火将熄，但我还有时间改我的过去种种谬误——随波逐流，赶潮流，听人们说过的话自己又重复一遍的话。我要说我的真心话。（1981年11月29日）

上午到人大会议浙江厅，乔木同志接见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。巴金谈“无为而治”、“爱护作家”等。乔木同志大谈“有为与无为，治与不治”，实即反驳。大家谈及新华书店发行问题，有冯至、韦君宜，我也说话。我又激动万状，实不可取，今后一定改……（1981年12月21日）（转引自梁秉堃《老师曹禺的后半生》）

在1983年1月写给巴金的另一封信中，曹禺更是坦言“十分讨厌我自己”：

上次曾向你谈起我一生曾作过两三次彩色梦。在医院中，居然梦起孩童时游玩，走入美丽的森林里，那真是破天荒的奇迹。我写表态文章总“雄赳赳气昂昂”；卧梦中，便显出原形。一个人表起态来，可以有七十二变化。但梦中，却似被金箍棒打醒，真面目出现，我常因此十分讨厌我自己！（1983年1月12日）

读这些日记和信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痛苦挣扎的曹禺，一个外在与内心决然分裂的曹禺。他的后半生，直到1996年去世，其实一直处在这种自我折磨的精神状态而无法自拔。

最能理解曹禺性格的是他的女儿万方。万方的《灵魂的石头》读后让人感叹不已。她不仰视，也不偏爱，解剖冷静而客观，一种只属于曹禺的精神状态，被描述得极为透彻且具震撼力：

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。这痛苦不像“文革”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，人人不可幸免。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。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，我猜想：痛苦大约像是一

把钥匙，唯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。他知道这一点，他感到放心，甚至感到某种欣慰。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，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，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游戏。真正的他则永远被锁在门的里面。也许里面已经人去楼空，他不知道，也并不真的想知道。但是痛苦确实是痛苦，绝没有掺一点假。

这是一个戏剧天才、一个知识分子弱者的痛苦。

黄永玉的知己评价

2010年，曹禺先生诞辰百年。在描述与反思晚年曹禺的诸多文章中，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频率很高，他就是画家黄永玉。他在信中对曹禺所说的一番话被人们反复引用，以感叹和反思曹禺后半生艺术创作的苦闷与孤独。与此同时，也有喜爱曹禺的人对黄永玉的这封信持有异议。无论怎样，在描述曹禺后半生的思想、性格时，黄永玉1983年写给曹禺的信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。

黄永玉回忆说，他与曹禺来往并不多，最初的见面，是在1950年。当时，黄永玉从香港来到北京看望沈从文，想亲自体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为自己是否离开香港定居北京做一番考察。正逢巴金来北京开会，巴金、曹禺、萧乾等一行人，一起来看望沈从文，那天黄永玉正好在座：

曹禺见了我，问沈从文：“这是你的大公子？”“不，不，不，我的侄儿。”后来，又在北京人艺见过面，等于没有见一样。（2010年11月，黄永玉在凤凰与李辉的谈话）

与曹禺来往不多，对他的戏，黄永玉却了如指掌。抗战期间，流浪闽南的少年黄永玉曾在演剧队数年，阅读与舞台排练，成了他熟悉曹禺作品的最好途径。

在纪念曹禺诞辰百年之际，我前往湘西凤凰，听87岁高龄的黄永玉，以自己的个人经历和独特表述，讲述曹禺印象。谈起曹禺剧作，他如数家珍。无限感慨，被习习秋风吹起，随黄叶飘落满地——

我一直看曹禺的话剧，我都能背。那天我就对曹禺讲：“你别动，我自己过来。”曹禺就哈哈大笑：“你还记得我这句台词。”这是《原野》里白傻子说的。

.....

曹禺软弱，没有胆量。他一直战战兢兢。其实他也不是搞政治的。他又不像沈从文那样，还和第三条道路关系那么密切，他怎么那么怕呀？不知道。

……白傻子从火车上跳下来，仇虎很可怕，白傻子很害怕。仇虎说你过来，他不来。仇虎又说：你来不来？白傻子赶紧说：“你别动，我自己过来。”他（曹禺）有点像白傻子。

他解放前写的一个剧本《正在想》，说一个跑江湖的班子，领班的叫做老倭瓜，老倭瓜有一个大黄铜表，这么厚的一个挂表，拿出来一看，现在是九点，九点就是十一点。那表慢了两个小时。实际上，你（曹禺）就是老倭瓜，但我不能写出来伤他（曹禺）的心。他不懂得珍惜自己。

黄永玉的漫谈，满溢感伤，这正是他在1983年3月致信曹禺时的那种冲动。其时《苦恋》风波已过，文艺界的人际往来于起伏跌宕中延续。在某一次场合的见面畅谈后，曹禺与黄永玉有了通信往来。

收到曹禺的第一封来信（可惜此信暂未找到）后，黄永玉于3月20日回复曹禺，并随信附去他写于“五七干校”期间的长诗《老婆呀！不要哭》。他的信，业已公开的只是部分段落，这里全文发表如下：

家宝公：

来信收到。我们从故乡回京刚十天，过一周左右又得去香港两个月，约莫六月间才转得来，事情倒不俗，只可惜空耗了时光。

奉上拙诗一首，是类乎劳改的那三年的第一年的诗，诗刊朋友问我要近作，而目下毫无诗意抒发，将信将疑从匣中取出这首给他看，却说好。人受称赞总是高兴。但这诗不是好，是公开的私事满足了人的好奇心而已。不过我老婆是衷心快意的，等于手臂上刺着牢不可破的对她的忠贞，让所有的朋友了解我当了三十六年的俘虏的确是心甘情愿。歌颂